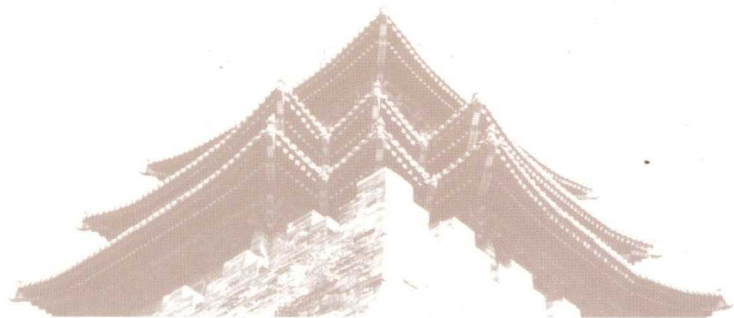




从鲁迅到老舍

—— 兼及东亚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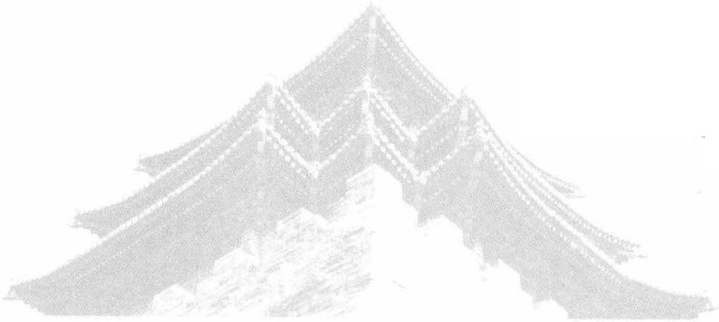
● 魏韶华 李红玲 刘红涛 著

CONG LUXUN
DAO LAOSH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研究项目

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立项



从鲁迅到老舍

—— 兼及东亚的视野

● 魏韶华 李红玲 刘红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鲁迅到老舍——兼及东亚的视野 / 魏韶华, 李红玲, 刘红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04 - 9270 - 2

I. ①从… II. ①魏…②李…③刘… III. ①鲁迅 (1881 ~ 1936) - 人物研究②老舍 (1899 ~ 1966)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7901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王俊超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鲁 迅 篇

“阐释河流”中的“鲁迅影像”	(3)
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思想原论”	(66)
鲁迅早期“个人思想”的缘起及其东亚价值	(92)
鲁迅视阈中的中国国民信仰	(103)
鲁迅与广义民俗学	(117)
近二十年鲁迅传记写作综述	(129)

老 舍 篇

“文本旅行”中的《四世同堂》	(145)
“老舍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214)
《大地龙蛇》与老舍的东亚文化想象	(242)
老舍与文化人类学	(255)
老舍研究在韩国	(265)

附 文学史知识二分法及其意义	(278)
后记	(289)

鲁 迅 篇

“阐释河流”中的“鲁迅影像”

鲁迅无时无刻不在被人言说着、鲁迅形象无时无刻不在被人构筑着，鲁迅正存活在这种不断的言说和构筑中。至今关于鲁迅的各种传记已有 30 多部，而对这些传记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通过近百年来四个不同历史时期中人们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梳理出不同历史阶段鲁迅形象的演化；钱理群也在《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中指出：不同层次的读者都从各自的时代和个性出发，不断地建构、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地丰富“鲁迅”本体，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阐释过程。真正对鲁迅传记进行全面细致梳理的是张梦阳的《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作者在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认真梳理、评述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科学地评析这 27 种鲁迅传的得失，从理论上总结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经验，探索新版鲁迅传的写作新路，不仅对鲁迅研究会有所推动，而且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传记写作以至整个传记学的理论建设都会有所裨益。”^①但从整个鲁迅“阐释河流”中对鲁迅传记进行研究，并结合社会历史及文化原因探究不同时期所产生的鲁迅传记中鲁迅形象的演变在目前还未形成专著专论。因此，以鲁迅传记为中心，勾勒出整个“阐释河流”中鲁迅形象的演变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① 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鲁迅研究月刊》2000 年第 3 期，第 61—65 页。

“阐释”是在理解文本中读者的能动性显现，而文本的历史和动态本质是：存在于时间系列中接受视野的不断交替演化中，是与阐释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是“效应史”中永无终结的展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阐释者总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境遇不断地修正许多既定的观念和日积月累形成的习惯，对既往的阐释进行重新阐释，使之更具有当代性。新的阐释在与以往阐释的对比与重复里重写、问答、重建，对以往的事件重新审查，与以往的争论一起争论，有时还要抽出身来，做一个全新的定位和评价，这就是阐释的历史性。阐释学主张：在通常的文学史中应该将历史性阅读居于阅读的首位。^① 阐释的当代性特征即是在现在时间之下展开当下意义与当下命题的层次，而且是在理解中，通过综合，从整体上把握或理解各种阐释的当代意义，这也就是阐释学所说的“理解总是在特定情境、特定条件下，由特定的个人实施运作的”^②。也即是对于阐释对象把握的方向和重点都要与阐释主体的阐释目的暗合，这就是阐释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阐释总是具体情境下阐释者的创意、引申与发展。当然，这种创意、引申与发展不能离开阐释对象本体。

就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人物传记是考量其生平和接受的重要依凭。人物传记的作者有时同时具有“读者”和“作者”双重身份，特别是对一些作家传记的作者来说。他们通过阅读传主的作品去理解和阐释传主，又在自己的传记中应用于对传主的阐释和理解。因此，“鲁迅”作为阐释对象也可被视为一个“文本”，他同样有一个不断被当代化的过程，即鲁迅形象有一个演变史。以鲁迅传记为着眼点去探究鲁迅形象的演变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不同时期的鲁迅传记对于鲁迅形象的建构，都鲜明地体现

① 金元浦：《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② 同上。

了传记作者所处时代的特征。这些传记写作的目的当然主要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形象，可真实的尺度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鲁迅形象一直体现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无论鲁迅的文学还是思想，都是在“当代”文化理论、“当代”人的精神构成内被阐释的。

鲁迅形象经历了一个由“个人—集体—个人”建构的演变过程，也即是由1931年第一部鲁迅传——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诞生至“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个体化鲁迅形象的塑造，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石一歌《鲁迅传》的集体化阐释，再到“文化大革命”后的个性化鲁迅形象的建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力图还原“真实”的鲁迅（包括鲁迅形象的解构论者）。然而“处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各自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必然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有不同的理解、解释和评价，这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很大”^①。“此外，同一历史时期的读者、读者集团和社会阶层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文化程度、生活经历和欣赏趣味的差异，因而对作品的理解、解释与评价也会大不一样。占主导地位的接受意见往往决定某一时代对某个作家或作品一般的理解和评价。”^②但是，阐释者并没有放弃建构真实鲁迅的梦想，尽管绝对意义上的真实的鲁迅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但阐释者可以在阐释之路上接近，再接近。何况，接近鲁迅的过程也是接近阐释主体自我世界的过程。真正有建树的阐释不在于全面刷新以往有关鲁迅的言说，或者彻底否定以往的结论，即使泛政治化的阐释，也还是要考虑阐释的特定历史性。这样，新的阐释又是在对以往阐释成果尊重的前提下弥补以往的阐释盲点。所以，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到鲁迅形象的动态演变以及鲁迅形象与阐释主体间相互生

①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② 同上。

成的互动过程上。在这一总体思路的基础上，以时间顺序为经，以同一时期产生的鲁迅传记为纬展开研究。传记作者从自己所处的历史语境出发，使鲁迅形象经历了由启蒙者鲁迅逐渐走向政治形态的鲁迅，以后又还原为启蒙者鲁迅，同时深化了文化巨人与精神伟人的巨大空间与深邃世界，再转向探索个体鲁迅的多个侧面，最后汇合成多元、立体的鲁迅形象：“民族精神的缔造者”、饱含“人文关怀的学者”以及“自由主义者”、“蔑视偶像的莱莫斯”、“社会公民”、“受凌辱最甚的人”^①等。但这其中又包含着一个解构的过程：解构者亦从反思政治形态的鲁迅被神化出发，发展到为了打破鲁迅神话而进行的缺少学理性的全盘否定，再经由俗化的论争，最后升级为对鲁迅形象的全面颠覆：从思想到文学，再到人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建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一种解构。反之，解构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建构。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形象的建构，也即鲁迅的阐释史，其实质就是鲁迅作为一个文本的接受史。姚斯说：“我们把诠释过程看作由理解（intelligere）、阐释（interpretare）和应用（applicare）三个瞬间过程组成的统一体。”^②“理解、阐释和应用（在诠释过程中完成）的三位统一体与三个相关视野——主体视野、解释视野和触发视野——是相互适应的。”^③接受美学的所谓具体化或客观化，似乎都是在提倡一种新意识——效应史意识。效应史意识是阐释活动的主导意识，是阐释与寻找意义，或曰抛弃以往文学理论研究中一味注意作品的因素和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的“旧价值”，而寻求置读者于阐释设计中心的新价值。因此一个作家的

① 上述观点参见《走近鲁迅》，《收获》2001年第2—6期。分别为陈思和、黎湘萍、王富仁、章培恒的观点。

② [德] H. R. 姚斯、[美] R. C. 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③ 同上。

价值就是在他被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读者进行不断理解、阐释和应用的过程中逐步彰显出来的。

鲁迅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使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话语资源。不同时代及置身其中的不同个体都构筑起自己的“鲁迅观”和“鲁迅形象”，不同的“鲁迅观”和“鲁迅形象”的论辩与冲突构成了一道充满喧哗的文化景观。我们试图通过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七十多年间产生的鲁迅传记，勾勒出这一文化景观中鲁迅形象的演变过程，从而获得对鲁迅形象演变的整体性认识。而选取在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鲁迅传记作为研究对象当是一条最恰当、最有效的途径。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寻绎步入“鲁迅世界”的恰当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为透镜考量整个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的脉动，并为当下的鲁迅研究提供借鉴。

毫无疑问，鲁迅形象的塑造会随着社会制度和文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但研究鲁迅形象的演变其意义并非单纯至此。鲁迅是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形象的塑造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精神的剖析与描述。换言之，考察鲁迅形象的演变也就是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状况，这一演变过程几乎可以勾勒出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史。鲁迅形象的演变既可归因于西方思潮“外部冲击”的影响，也源自于鲁迅形象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内部需要，即在建构鲁迅形象的背后，隐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精神选择。可以说，不同时期鲁迅形象的建构，与中国知识分子在其所处的不同时代的文化环境中的精神构成密切相关。一方面，被建构的鲁迅形象参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如何反观自身，也便如何建构他们心中的鲁迅形象。

总之，本书试图通过对鲁迅传记的考察，更深切地领悟到：“历史经验的特点是我们身在一个事件之中而不知道我们周围发生的是什麼，后来在回顾时才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因此历史必须

由每一个新的现在重新撰写。”^①当然，重新撰写不是目的，通过重新撰写、重新思考阐释者如何反思、对抗、清理阐释学对于鲁迅形象建构的隐在影响，才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它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唤醒自我、寻找自我、建构自我、审视自我的一种方式。

一、1931—1949：正反批评中所显出的原生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袁世凯复辟等事件，中国的政治、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只有文化在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发出怒吼，以狂飙突进之势涤荡着封建思想的流毒，将科学、民主的观念植入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这一特定的时局特征和文化背景无疑对于当时的鲁迅研究和批评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鲁迅阐释史上阐释主体与鲁迅形象之间密切相关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时期，虽然鲁迅的启蒙者身份一开始就被确认，但阐释者大多是处于自在状态的直觉批评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阐释者曾经拥有过相当充分的主体自主性，即使在革命文学论争之时，鲁迅的启蒙者形象遭到激进思想的质疑时，阐释者也还是能够拥有一定的批评空间的。

1. 同时代人眼中鲁迅的真实人生

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民众和在野党派一般仍可以批评政府及执政党，但政府和执政党却很少听取批评者的意见。由于民主制度的缺位，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作威作福也就无法避免。进步知识分子就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走完了自己历经坎坷

^① [德]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集》，严平编选，邓安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的一生，安详地闭上了双眼。10月22日，数万民众自发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葬礼，在一片挽歌声中，覆盖着“民族魂”之旗的鲁迅灵柩徐徐入穴。巨星陨落，万众同悲。一个停止了言说的人将在别人的言说中延续他的生命，从此以后，鲁迅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话语资源，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都将构筑起自己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鲁迅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幼年时家道中落，看惯了世态炎凉；他掂着脚尖到药店为父亲买药，并终生痛恨耽误了父亲性命的中医；他看到中国人围观日军屠杀同胞的幻灯片，深悟国民麻木的可怕，于是准备以文艺拯救国人的灵魂；他把朱安视为母亲的“礼物”，强烈反对封建礼教的他，却成了孝道的牺牲品；他多疑，把疯人杨树达的“袭来”想象成是别有用心心的骚扰；他固执，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毫不留情，在厦门大学演讲，校长先请他吃饭再让他登台，他却依然对校长的治校之道发难；他的韧性体现在他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上，他的温情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柔石、刘和珍、萧红、殷夫这些青年父爱般的关怀上；他矮小并且身着陋袍，他抽烟并且多为劣质；他在教育部任佥事并且在多所学校任教，是为了养家；他曾在家研佛抄碑，也曾苦读唯物主义与马列著作；他写杂文“骂人”，就是要给论敌添点“小不舒服”……

在鲁迅去世前，作为文坛巨人，他的形象就被人们塑造着。最早的鲁迅传是由鲁迅的私淑弟子增田涉写于1931年公开发表于1932年4月东京的《改造》杂志上的《鲁迅的印象》，曾被误为佐藤春夫所作，据说曾得到过鲁迅的认可。此外还有1934年王森然的《周树人先生评传》，1935年美国记者斯诺的《鲁迅——白话大师》，1941年小田岳夫的《鲁迅传》等。通过这些传记以及周作人、许广平、孙伏园、许寿裳、内山完造等鲁迅的亲人和朋友的回忆，可以为我们勾勒出鲁迅的真实人生。

上海文学书店出版的增田涉写的《鲁迅的印象》，署名佐藤春夫，梁成译，用简洁的笔触粗糙地勾勒了鲁迅的一生，约有3万字左右，文中大量引用了鲁迅的作品，以及同时代人对鲁迅作品的评论，其中虽有误记之处，却因是与鲁迅有过亲密接触之后所作，故有真实之感。在叙述上延续了鲁迅自传所提供的基本生活经历，又有所补充与评价。鲁迅在南京求学时，“他是沉醉于像少年似的浪漫的人道主义，兴奋地在努力着”^①，因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得到省费到日本去留学”^②。在留学期间，“鲁迅已经是推翻清朝的革命党党员了”^③，积极参加各种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实际运动。由于家人需要他的经济援助，不得不于29岁那年回国。先在杭州师范任教，后在绍兴中学当教务主任，但不到半年就跑掉了，是因为“他和无论哪一个上自校长下至所有古董的道学先生的同事吵架，思想上不对的缘故”^④。待到“都督（王金发）要杀害鲁迅的消息带到他（鲁迅）那里，鲁迅拔腿就逃到了南京去”^⑤，在教育部任职。这些记述与后来鲁迅传记中对这些事件中善于战斗、富有反抗精神的鲁迅形象的塑造大相径庭，更像生活在你我身边的普通人。

王森然曾在北大听鲁迅讲过《苦闷的象征》，他的评传勾勒出了生活中的鲁迅。“先生上课，至独早，去至迟。尝挟书包，至大红楼前，列席棚中便饭。玉菽窝头，芥面条子，与人力车夫，卖报童叟，共坐一凳，欣然大餐。”^⑥“先生上课时，其铅笔恒置右耳上，备以更正讲义中之错字者。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其

① [日] 佐藤春夫：《鲁迅传记及其他》，上海文学书店，第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7页。

④ 同上书，第9页。

⑤ 同上。

⑥ 王森然：《周树人先生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4页；本书1932年原版和1984年重版时书名均为《近代二十家评传》。

笔仍置耳上不动。下课后先生置棚中吃饭，余蹒跚其行，至御河桥上，北望五龙亭，挟书伫立。先生口衔纸烟，囚发蓝衫，坐人力车过此，微笑点头，视之，其笔仍在耳上也。”^①许广平则作如是说：“在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鹬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②一个不修边幅、平易近人的鲁迅跃然纸上。

小田岳夫在鲁迅逝世几个月后才到鲁迅家去拜访过，他跟鲁迅并没有实际的交往，但他的《鲁迅传》却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孙文是制造新中国的外表的人。而鲁迅，同他比起来，却是为制造新中国的实质而毕身忍受着苦痛的人”^③，也即“中国精神的缔造者”。鲁迅写作小说的目的“是在中国人的人性的改革”，而“并没有想做小说家的意欲和野心”（同增田涉一样，强调“启蒙思想家”才是鲁迅努力的目标，“作家”是实现这一目标意外的结果），在写作的过程中，鲁迅制造着孤独，品尝着孤独，“渐渐地他和文化界一般人的步调不同，带有了孤高的风度”^④。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向被鲁迅研究界认为是鲁迅思想由进化论转为唯物论的分水岭，小田岳夫却有不同观点，认为鲁迅

① 王森然：《周树人先生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4页。

②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③ [日]小田岳夫：《鲁迅传》，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版，第2页。

④ 同上书，第52页。

并未受唯物主义的影响，“他的这种转变的出发点，乃是他苦恼着没有权力去救助那些弱者，这是基于他的固有的一种人道主义的志向的”^①。对于鲁迅参加“左联”，一般人都认为鲁迅是转向甚至投降了，但小田氏认为，“虽然他有态度的发展，但却从来不曾转向过”^②。这与斯诺和增田涉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鲁迅的思想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并不存在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断裂与飞跃。对于鲁迅的性格，小田氏则认为鲁迅有“洁癖的性情……鲁迅的心境多少带有着被迫害者那样的成分”^③。

1935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在鲁迅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也是唯一经由鲁迅亲自批阅过的，它虽不是一本纯粹的鲁迅传记，但它的第五章《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却深入到了鲁迅的文化心理、性格特征和生命哲学等各个方面，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独特理解。作者把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主客观的相互关系的推动上，探讨鲁迅创作不断向前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塑造出一个动态的鲁迅。

“倘若诗人的意义，是指在从事于文艺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观的，情绪的，而离庸常人所应付的实生活相远的话，则无疑地，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是一个战士。”^④李长之称鲁迅为诗人，却又不是吟风弄月的那一派，因为鲁迅“所有的，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一种粗暴的力”^⑤。正是这种情感上的粗暴，使鲁迅对于优美缺乏鉴赏力，只能欣赏“力的表现”的木刻。又说鲁迅“是枯燥的”，“性格上是内倾的”，

① [日]小田岳夫：《鲁迅传》，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版，第72页。

② 同上书，第79页。

③ 同上书，第65—66页。

④ 李长之：《鲁迅批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⑤ 同上书，第136—137页。

“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理智上却是健康的，这种性格使鲁迅在情绪的表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又使他难以写出长篇小说。

“鲁迅像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情感一方面极容易兴奋，然而一方面却又极容易沮丧。”^①因而鲁迅“非常脆弱”，“太锐感”，“容易变到多疑上去”，但却“是一个再善良也没有的人”。^②小资产阶级的根性使鲁迅容易走上个人主义的道路。“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③，“他在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这一切都无损于鲁迅成为一个战士，“他在战士方面，是成了一个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运动的保护者了，这是我们每一思念及我们的时代，所不能忘却的！”^④“诗人是情绪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被动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而鲁迅更是的。”因此，鲁迅确定无疑是个诗人。另外，李长之又特别看重鲁迅的战斗精神及其战士的本色。在书的结尾，作者用“诗人”和“战士”两个词概括鲁迅，说道：“撇开功利不谈，诗人的鲁迅，是有他的永久价值的，战士的鲁迅，也有他的时代的价值！”^⑤

此后的几年里，毛泽东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审美观念出发给予了鲁迅极高的评价。1938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大会上，毛泽东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⑥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给予鲁迅更详细的评价：

① 李长之：《鲁迅批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② 同上书，第150页。

③ 同上书，第160页。

④ 同上书，第161页。

⑤ 同上书，第162页。

⑥ 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